

新人文对话录丛书

王蒙

郜元宝

对话录



苏州大学出版社

SUZHOU UNIVERSITY PRESS

新人文对话录丛书

王尧 林建法 主编

王
蒙

郅
元
宝

对话录



B1280928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郅元宝对话录/王蒙,郅元宝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8

(新人文对话录丛书/王尧,林建法主编)

ISBN 7 - 81090 - 132 - X

I. 王… II. ①王…②郅… III. 当代文学 - 文学
评论 - 中国 IV. 1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849 号

王蒙郅元宝对话录

著者/王蒙 郅元宝

责任编辑/陈长荣

出版发行/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215021)

经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丹阳教育印刷厂

版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字数/137 千

印张/6.875

印数/1 - 10000 册

书号/ISBN 7-81090-132-X/I · 4

定价/13.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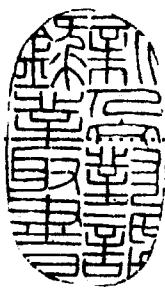
王蒙

总序

王尧 林建法

我们想在“对话的时代”以“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纪念因为思和想而拥有的痛苦和快乐。

20 世纪 90 年代那场未果的“人文精神”讨论，凸显了知识分子在 80 年代末期开始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源于人们对人文传统认识的差异，也与人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变化了的现实有关。这是从一种体制转向另外一种体制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处境的体认和表达渐趋分化。对中国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的解释，一直有仁智之见。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开始使用的“人文主义”这个词，即使在西方也是含义多变的，在各种版本的大百科全书中，“人文主义”的定义不尽相同。所以，“人文主义”虽然在中国广为使用，看似约定俗成，但其实是个概念含混的词。“人文”就字面而言，中文与西文相仿。《易经》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显然，“人文”的中西涵义有差别，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中的“人文”涵义也有差别。因此，有学者建议不妨把“人



文主义”译成“唯人论”或“人学”，这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命名。正因为是“人学”，分歧也就不可避免了。即使智者仁者对中国是否有“人文精神”存在着分歧，对西方“人文主义”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不管怎样，“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对历史特别是现实作出独立的解释，需要对历史如何塑造自己作出深刻的反省，需要对自身的精神处境作出清醒的判断。这样的解释、反省与判断，不仅可以见出理论与思想力量的强弱，思考路径的异同，而且也可以分别出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立场。

因此，我们试图在分歧中寻找出交结点，寻找出相同的话题，就像美国的《人文》杂志所希望的那样，“不同学科的写作，能够指向一个发展中的、普遍的思想核心，作者用相互关联的眼光和方法，从不同的视角阐述核心问题”。在这种求同存异的阐述中，我们放弃那种急于给思潮、群体和问题定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仓促，而且过于自信。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遭遇的问题，都迫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信念和勇气去面对，去思和想。无论我们以暧昧的方式，还是以直面的姿态对待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总有一些问题蛊惑着思想者。也许，这可以视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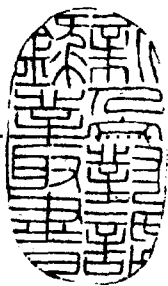
的底线，守住这一底线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裸露出他的立场。掩饰也是一种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去发现真正而动人的问题，表达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呈现被抑制的生命感受，应当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追寻的思想风度。“新人文”对话录之“新”，不是宣示一种已经成熟的思想，而是表达我们对目前所做工作的期待。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新人文”这一提法，它虽然和种种人文主义传统相联系，但是它不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徘徊，也撕去了“左翼”和“右翼”的标签。



在这套对话录丛书策划的过程中，我们（“我们”已经是个不能轻易使用的词）首先感觉到我们一些所谓的“人文知识分子”，其实愧对“人文”二字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称谓，因为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回应现实时，我们不时感受到自己的狭隘和无力，感受到清理知识与思想背景的重要。事实上，如果不能摆脱狭隘的视域，不能清理知识体系和思想背景，那么，所谓的“批判”和“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有过株守疆域、止步藩篱的教训。所以，我们期待有一次思想的飞翔。由这套丛书结集起来的一批人，基本上是“人文知识分子”一类。我们在各自的对话中，几乎都讨论到“知识分子”问题。尽管大家对“知识分子”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但都非常谨慎地

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一些朋友不敢轻易地称自己为“知识分子”；而另外一些朋友则毫不犹豫地以“知识分子”相称，并且鲜明地突出自己认为的知识分子立场。由这套丛书的“思想状况”，大致可以见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部分轮廓。我们对思想文化问题的种种解释，散发着各自生命的体温，在一定意义上，这套对话录丛书也是对话者的精神自叙。西方哲人说过，一些人是为发现真理，一些人发表意见。我们当然是属于后者，而且是那种不羞于发表错误意见的一些人。

这样一点自我认识，其实也与对话体这一自由文体的特征相吻合。试图推动对话文体发展，也是我们的企图之一。那种面对面的对话，改变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创造了一种思想的现场。也许，在讨论问题时对话可能失之于粗疏，但是，对话因此而呈现了思想的原生态，因此而与其他文体相区别。正是在对话之后，我们发现了对话的不易。所以，在这套丛书即将付梓之际，作为主编，我们由衷地感谢应邀参加对话的朋友们，感谢苏州大学出版社以及负责此项工作的陈长荣先生，感谢喜欢和不喜欢这套书的读者。读者也是我们的对话者。



1
我讨厌所谓“中国文学正在走向
世界”的说法

19
关于“海外华文文学”及其他

89
勿舍本逐末

133
恐怕要令精英学者们气得发昏

173
中国文学的命运：从旧诗到新诗

205
后记

我讨厌所谓“中国文学正在走向世界”的说法

本来，诺贝尔文学奖是服务于文学的，是从文学派生出来的，可是，至少目前在我国就有那么一批人，他们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上帝，当作天神，跪在那儿匍匐，回过头来视中国作家如草芥。

MAF57/02

我讨厌所谓“中国文学正在走向世界”的说法



- > 从马尔克斯说起
- > 东方和西方在艺术上的隔膜
- > “义和团”:一段历史,一种象征
- > 高压政治下的性调侃和性幻想
- > 我讨厌所谓“中国文学正在走向世界”的说法
- > “诺贝尔文学奖”:激怒公牛的一块红布
- > 如何看待中国的翻译文学和文学的翻译

——> 从马尔克斯说起

郜元宝：苏州大学的王尧教授和《当代作家评论》的林建法主编正在主编一套丛书，就是用对话录的形式，让当代中国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对于各种问题——当然主要还是文学问题——自由地发表意见。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和你做一次长篇对话。首先谢谢你在如此忙碌的情况下和我做这样的对话。

王蒙：这主意很好，我也很愿意谈。不过，首先你别当一般的采访人，我们一起谈，这样可以形成真正的对话，互相都有激励，有碰撞，思路也会打得更开一些。其次，你上次给我的那个书面对话提纲，许多问题都很有意思，我也很感兴趣，但是很抱歉，这一次我只想谈文学。有些话题我现在还不想深谈，有些资源我现在也不想过早地开放——比如我个人的经历问题。我们就谈谈文学吧，有什么问题不能拿到文学中来谈呢？

郜元宝：我尊重你的意见。那我们这回就把话题集中一点，专门谈谈文学。

王蒙：我看就先谈谈中国文学的一般问题吧。

郜元宝：谈中国文学，特别是谈现当代中国文学，离不开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问题，可否从这个话题开始？

王蒙：好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只是太大了，但也不妨随便谈谈。可以从某些我们认为特别有意义的现象开始，比如，应该怎样从整体上估价外国文学 100 年来对中国

文学的影响？

郜元宝：“五四”以来，许多作家都很自然地认为，中国新文学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是现代世界文学的一个分支。用胡风的话来说，中国新文学乃是世界现代文学在中国“新拓的支流”。鲁迅、周作人、林语堂、茅盾、梁实秋、巴金和艾青等人，都曾经一再强调过这一点，不管他们各人的文化立场和文学趣味怎样地不同，也不管他们中的有些人，比如周作人，后来观点有些变化，在承认中国新文学属于 20 世纪世界文学、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中国新文学这一点上，并没有多少意见分歧。20 世纪 40 年代延安解放区的文学起来之后，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学界的这个共识就被逐渐冲淡了。没有人公开拒绝外国文学，但重心已经落到所谓“民族形式”、“中国气派”之类的话题上去了。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直到 80 年代，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越来越专门化，不再像“五四”直到 30 年代那样，和中国本土的文学创造同步进行，互相滋养。我们实际上已经不太愿意承认我们

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分支，而更喜欢讲我们是中国文学，认为它的资源、它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它的发展动力都是中国的，或者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这是否有点不自觉的自我封闭呢？

王蒙：我过去没有太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按照你的讲法，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的关系，难道就完全中断了吗？似乎不能这么说吧？

郅元宝：确实没有完全中断，因为即使在强调中国文学本位的时候，作家们在创作中仍然有意无意地向外国文学学习取经。这个一直没有中断。不过，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直到70年代末期，所谓外国文学的影响实际上主要是苏联文学的影响，至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的影响，要说有的话，也只能是潜在的。80年代以后，外国文学的潜在影响这才再一次浮出水面，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向世界先进文学展开了新一轮的公开的追求乃至刻意的模仿。

王蒙：但就是自80年代以来，学习外国文学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在80年代就曾经有过几次波折，我们也都还记忆犹新。

郅元宝：对。来自各方面的力量，仍然在干扰着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的重新对话，而且这种干扰也并非完全来自外部，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界内部，也存在着由于对外国文学认识不足因而学习的时候步伐难免有些紊乱的情形。所以，我们谈当代文学，谈现代文学，不能回避外国文学的影响，在这个总的前提性评估下面，各人的看法可以不太一样。比如，外国文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

国文学，影响的具体方式怎样，影响的结果如何，即这种影响怎样表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等等，这些具体问题，单靠理论是讲不清楚的，必须着眼于中国作家的创作实际。

王蒙：我想具体地围绕一个作家来展开这个问题，那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这20年里，他在中国可以说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别的作家在中国也有影响，像卡夫卡、博尔赫斯，还有三岛由纪夫，一直到苏联的艾托玛妥夫，捷克的米兰·昆德拉，都是在中国红得透紫的作家。但是，达到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程度的还是比较少的。我记得莫言就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表示过他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敬佩。

郜元宝：莫言早期的创作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最大，虽然他近来好像又有点故意要和马尔克斯“撇清”的意思。

王蒙：那是现在，当时应该不是这样的吧？最近我也听到余华讲了他对马尔克斯的崇拜。

郜元宝：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有共同的处境的关系？

王蒙：肯定有这层关系在起作用，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多作家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受到一位拉美作家如此巨大的影响。崇拜马尔克斯的，决不只是莫言、余华两个人。

郜元宝：韩少功当时提倡“寻根”，写《爸爸爸》等小说，也多少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

王蒙：对。在他后来的《马桥词典》中，就内容来说，也还可以看到这种影响。我觉得《小鲍庄》也是受了《百年孤独》的影响，虽然它很短。

郜元宝：《小鲍庄》是王安忆从美洲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写的。

王蒙：《丰乳肥臀》可能更明显。甚至张炜的一些小说，像《九月寓言》、《家族》，其中也有这个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文学上的一大贡献，就是把不发达情况下的风俗——现在我说这个话都不含褒义或贬义，与社会学、政治学上的意义无关，只是客观描述——还有迷信、贫穷、落后、疾病、残疾、怪异等都变成审美的对象。无独有偶，也有人说米兰·昆德拉的一个贡献（这是许多西方人的观点）是把生活审美化了，变成一种或者是喜剧的，或者是悲剧的，总而言之是戏剧化的而且是修辞化的材料。

郜元宝：一个是现实魔幻的美，一个是政治荒诞的美。

王蒙：对。而且把它变成一个一个个的故事，一个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我们还是把话题集中在马尔克斯身上吧。简单地说，我觉得他是把那种最不现代的、非现代的东西审美化了，把它艺术化了，变成了故事，变成了传说，赋予了它一种魔力，一种魅力。当然，他的写法又非常的自

由，好像把人给解放了一样。这个东西搬到中国来特别管用。在中国，作家也很容易跑到一个北京话叫犄角旮旯的地方，一个闭塞的角落，写点东西来一鸣惊人。其实，大部分作家还是经过现代文明熏陶的，他只是反过来用现代文明之光照亮黑暗的一角，一下子把它照得稀奇古怪起来，将它变成描写的对象，变成了文学的形象。这确实是一绝。

郅元宝：这种写作的风尚，在中国文学界一度势力很大，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中国的电影。

王蒙：对，张艺谋的一些电影可能就受这个影响。

郅元宝：这是由于他的摹本就是文学。可是我也常常能听到一些批评，比如说，中国作家这么着迷马尔克斯，就像着迷博尔赫斯一样，都有点不大对头。迷博尔赫斯，于是乎大玩而特玩叙述上的迷宫效应，好像非要写得神秘，让读者不知所云，才算是好的小说。其实，博尔赫斯本人也未必如此。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那些中国摹本的批评，则往往说它们是刻意“审丑”，把